

●管继平

惊倒扬州郑板桥

—白蕉致姚鹤雏

云间自古多名士。自“云间陆士龙”以来，我觉得凡能以“云间”自号或鸣世的，多为性情洒脱、品格高洁之士，而且最好还是怀才不遇的失意人，或是拒不仕出的隐者，如西晋的“云间二陆”，明末以陈子龙为首的“云间三子”，还有“云间野鹤”陈眉公等。尽管此处的“云间”只是地名，但它的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份超尘绝俗的况味，总让人联想起“云中白鹤”的清高与孤傲，“闲云野鹤”的悠然和风雅。若是寻常的庸夫俗子，怎能配得上“云间”之号呢？

不过，以一手“二王书法”名闻天下的“云间白蕉”，无论从是他“名士”的风度还是“隐士”的态度来看，都是当之无愧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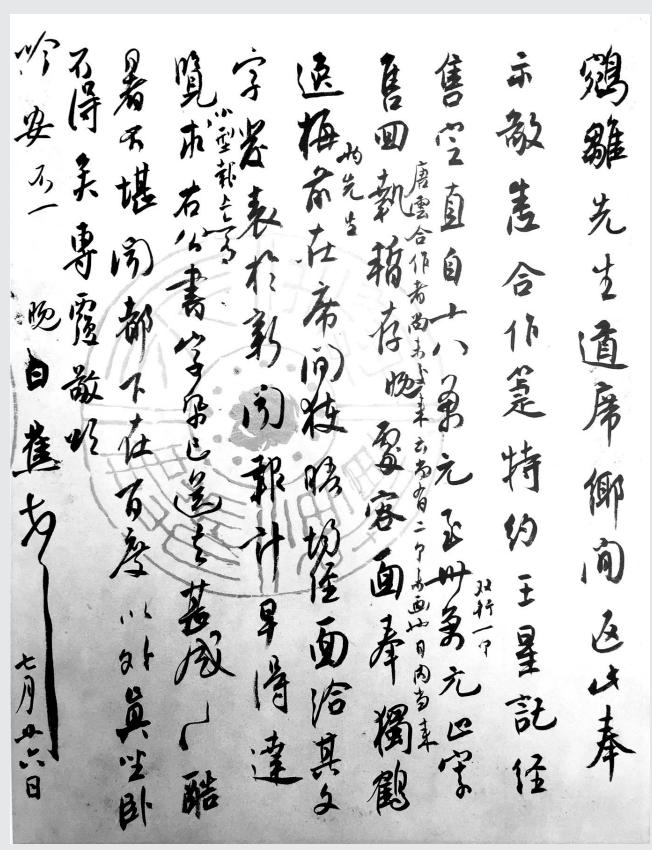
白蕉本姓何，生于金山张堰镇的一个中医世家，父亲悬壶济世，于当地一带小有名声。多年前，为了写一篇涉及南社的小文章，我曾专程去了张堰镇，寻访了高天梅以及高吹万和姚石子的故居。根据友人的引领，我也找到了同为新南社成员白蕉的当年住所：新尚路十六弄二号，然房屋陈旧，杂草垣垣，与镇上修葺一新的姚光故居、也就是如今的“南社纪念馆”形成巨大的反差。何况这十六弄内盘曲狭小，且多为外人混杂蜗居，使人很难想像这里以前会有一位尽得“江左风流”的大书家。

由于金山旧属华亭松江府，而松江古称云间，故白蕉常以云间居士、云间下士或云间白蕉自称。而其原名何治法，则无人知晓矣。白蕉有一方自刻印章“有何不可”，巧妙地透露了他的“何姓”，一语双关。至于他为什么废姓而不用，径称白蕉，坊间似有多种版本，但若以白蕉夫人金学仪先生的晚年追忆，说白蕉十六岁到上海求学时遇上了一位同乡女孩，一见倾心，坠入情网，但因门第不合而遭到双方父母的极力反对。后在一次痛苦分别时，女孩送了白蕉一枝白色的美人蕉花朵，从此，白蕉遂废姓而以“白蕉”为名了。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潮，那时的白蕉正热衷于写新诗，为了纪念自己的青春和爱情，他创作了一首新诗《白蕉》，并把自己的新诗作品结集，于一九二九年一月由上海励群书店出版，诗集的名字也叫《白蕉》。

而掌故大王郑逸梅先生说白蕉之名可能是受新思想的影响，或是与东瀛艺术家一样，不用姓仅以名行世，很是潇洒……相比之下，此说似不及金先生对“白蕉”由来的回忆更具体，也更具故事性。

作为“诗书画印”的全才，白蕉的天份无疑是超群的，格调也不俗。而且他学书并无明确的师承，十六岁考入上海英语专修学校时，幸识了徐悲鸿并受了一些影响和指点，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苦练和领悟。据其自述的学书经历是：“初学王羲之书，久徘徊于门外。后得《丧乱》《二谢》等摹本照片习之，稍得其意。又选《阁帖》上王字放大至盈尺，朝夕观摩，遂能得其神趣。”将帖本逐字放大，探求线条轨迹，揣摩笔法使转，这里所谓的“得其神趣”，其实不是靠单纯的临习，更多的是一种“悟”。据说白蕉常常将自己写好的字挂在墙上，近看三日，远观三天，稍有不满则撕去重来，往往十纸撕其九，又弃其一。就是这种近乎苛刻的不断自我否定，造就他不同寻常的手眼。因此，抗战时白蕉与邓散木合办了“杯水书画展”，才三十出头的他，锋芒初露便惊艳沪渎，后他又在上海首次举办了个人书法展，一时佳作四起，王蘧常写“三十书名动海陬，钟王各欲擅千秋”的诗句，也基本确立了他作为书坛帖学继承者的中坚地位。

白蕉曾自称是“诗第一，书第二，画第三”，他未将印章列入，我猜他可能并不看重自己的印章，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。如列入，尽管其印也有佳作，但与书画相比，只能屈居其末了。如此，恰是“诗书画印”的传统排列次序。我一直



认为，“诗书画印”的排列，可能是无意中的习惯，但它却暗藏着一个学艺递进之顺序。诗文是学问，书法是基础，有此二者，方可进一步学画或学印。白蕉其实以书法成就最高，画而次之。他的画虽题材有限，独擅兰草竹石，然逸笔草草，风格独立，也极具文人画之神韵。曾与高野侯、申石伽并称，得“白蕉兰、石伽竹、野侯梅”之美誉。画家好友唐云有诗赞之：“万派归宗漾酒瓢，许谁共论醉良宵；凭他笔挟东风转，惊倒扬州郑板桥。”

想来也颇有趣，既然画兰“惊倒板桥”，写字直抵“钟王”，难道做诗能追“李杜”乎？尽管尚未有人如此评说，但为何自以为“写诗”要超过“书画”？这使我想起了齐白石，虽然大家都认为他的书画篆刻成就明显要高出他的诗，但齐白石自己的排列顺序却是“诗一、书二、画三、印四”。在此，白石和白蕉，其实皆异口同声地表达了一个意思：就是更看重书家的学问，他们不希望是一个只会画画写字的艺术家。

说到写诗，白蕉倒是与一位前辈乡贤非常交好，时常过从请益，诗稿往还。这位忘年交即南社著名诗人姚鹤雏先生。姚鹤雏是松江人，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，师事著名文学家林琴南先生，能小说，善诗词，精书法，民国时曾任江苏省省长陈陶遗秘书，还于东南大学、南京美专等多所学校教授国文，一九四九年之后在上海文史馆馆员，并任过松江县副县长之职。白蕉与姚鹤雏有一段频繁的通信交往，时间约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三年前后。上海书画出版社曾编有一册《白蕉与姚鹤雏先生信札选》，此书我无，但我手边则有一本《姚鹤雏先生诗友唱和笺札拾珍》，同样也收录了近二十件白蕉致姚鹤雏先生的诗稿信札，其中一通信札如下：

鹤雏先生道席：乡间返此，奉呈敬悉。合作篆特约王星记经售，定直自十八万元至卅万元（双行一个），止寄售，回执暂存晚处，容面奉。（唐云合作者尚未交来，云尚有两个

■文人尺牍（二十五）

未画也。日内当来）。独鹤、逸梅两先生前在席间获晤，均经面洽，其文字发表于新闻报，计早得达览（小型报上亦有）。求右公书字纸已送去，甚感、甚感。酷暑不堪，闻都下在百度以外，真坐卧不得矣。专覆敬颂

吟安！不一

晚 白蕉 顿首 七月廿六日

这段时期白蕉与鹤雏先生的书札往还，多是以诗奉教、郢正之类，还有就是白蕉数次托鹤雏先生代请“右公”或“髯翁”书法以及白姚之间书扇合作事宜。过去文人之间的诗词教正奉答，也就是一种同道好友间的交往，其实并非真的求教。鹤雏先生年长于白蕉十五岁，就当时来看，其文坛资历和诗文成就等都较高，故白蕉书札皆以晚辈礼待之，极其恭敬。

此信主要是述鹤雏先生与白蕉合作书画扇让王星记扇庄寄售事，前已有函涉及。至于定价十八万、三十万云云，实际并无如此昂贵，估计也就相当于此前的几元十几元吧。须知那时正值内战期间，国内通货膨胀急剧上涨，若是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后金圆券的发行，那物价更是高得离谱，几亿元的大钞如同废纸，当时如果买纸糊墙，还不如直接把纸币直接用来糊墙更合算。信中还提及“独鹤、逸梅两先生”，可能是让郑逸梅撰文介绍，于严独鹤主政的《新闻报》上发表事。同时又再次提到了“右公”求墨宝事，猜想其时鹤雏老任职于南京，与于右任先生相近也时有交接。信末的“酷暑不堪，闻都下在百度以外”，当是指南京的华氏气温，一百度以外也就是今天的摄氏三十八度高温也。

欣赏白蕉的书札墨迹，真是可见其风采流丽，挥洒自如的状态，从这些书信中我们可感到其字风格俊逸、笔法精熟，已到了自由王国之境，尽管不是书法的展示，而是朋友间的函札，但展现给人们的却是至高的书艺享受，流畅中不失韵致，刚健中不乏婀娜，风流萧散，意趣高远。应该说白蕉书法，将“二王”的手札融会贯通，不仅是《丧乱》《二谢》，其他如《奉橘》《何如》《孔侍》《得示》《鹅群》等等，他可以说是尽得神髓，难怪沙孟海先生评之为“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”也。

传说中白蕉为人清高孤傲，不从流俗。建国之初，柳亚子为他写信推荐给华东军区主管文物处的徐森玉，让他自己带着信去谈，但白蕉却从未将柳亚子的信示人。他自恃才高，评包世臣、康有为的书法，极尽挖苦毒评之辞，说“包慎伯草书用笔，一路翻滚，大是卖膏药好汉表演花拳绣腿模样。康长索本是狂士，好作大言欺俗，其书颇似一根烂绳索”。足见其心高气傲，大有睥睨左右之态。故陈巨来的《安持人物琐记》中将白蕉也列为“十大狂人”之一，然而却并未写出什么具体的“狂傲”故事，只是含糊地说他可能“对沈尹默云云，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，使沈老大大不快”。

白蕉对沈尹默的态度究竟如何，众说纷纭无可定说。但在白蕉致姚鹤雏的书信中，有一标“二月十八日”之信，曾问及尹默先生，并希望获得承教，恳请公为之介绍。可见白蕉还是颇尊重沈尹默这位帖学前辈的。至于后来他们同在一个画院，是否有其他误会，因无具体事例，只能暂且存疑。如今，随着白蕉书法的逐渐被重视，白蕉的书学地位也屡被提出，作为当代的帖学代表人物，常常会有人将白蕉与沈尹默先生相提并论，或尊白抑沈，或尊沈抑白，真是“梅雪争春未肯降”矣。不过就我个人以为，白蕉的书札体自然可称“天下第一”。要胜沈一筹，然而沈尹老不仅是二王行草，其精妙绝伦的晋唐楷书以及魏碑、隶书以及自我的风格塑造，却是白蕉所不及。此也可谓“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”也！

又到每年“两会”时，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缘故，对出席全国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较为关注，总想看看他们针对书法讲了些什么？又提了些什么？

今年“两会”可以说将书法推到了新闻的焦点，百余名政协委员联名倡议：写好中国字，做好中国人。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作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，呼吁“学好汉字、写好汉字，已成为关系到中华自信、优秀文化传承、民族凝聚力提升甚至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，全体国人都应该对此高度重视”。后又在“政协委员谈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”的记者会上，他再次强调“落实国家传统文化传承工程，书法进课堂必不可少”。书法在“两会”上这样有头有脸或许还是第一次，真的不容易！

据悉，苏士澍先生为了这个提案时达八年，奔走疾呼。在2009年3月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，当时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、全国政协书画室副主任、国家文物局出版社社长就作了题为《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刻不容缓》大会发言，这为推动“书法进课堂”做了一个重要铺垫。后来，参加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又陆续提出了《关于加强青少年汉字书写教育的提案》《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加强汉字书写能力的提案》《普及书法基础教育，让传统的书法进入中小学生的教育课堂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程的提案》《关于进一步落实书法教育进课堂的提案》以及建议通过立法设立“汉字书法日”，呼吁青少年练习毛笔字、学繁体字和继续推进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意见等。应该肯定，多年来参加“两会”的书法家们一致在努力着，他们为中国书法的教育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，参政议政，促进了中国书法教育的改革，可谓功不可没。有的提案和建议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采纳，同时出台了少书法教育方面的配套措施和纲要。比如，2011年8月国家教育部下发了《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》；2012年教育部举办了首届书法教学与创作高级研修班；2013年1月教育部又公布了《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》；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了《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》；2015年教育部下发了《关于2015年义务教育书法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；2016年底教育部提出将书法课本列为国家教材，成绩纳入中高考系统；今年，在“两会部长通道”上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要拓展校园文化，传统戏曲、国画、书法、中医药、传统体育、武术、太极都可以进校园。前不久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，从国家战略高度强调要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，进一步“推进戏曲、书法、高雅艺术、传统体育等进校园”。

“两会”为书法教育与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，同时也提醒着我们“艺术改变中国，既需要通过作品影响人们的审美趣味，也需要从上层建筑入手，扩大艺术在公共政策中的话语权”。《雅昌艺术网》开设一个栏目叫“艺术问政”，主要聚焦出席“两会”艺术家们的提案与专访，不过，这个栏目也仅仅是提案的收集，没有去跟踪提案，当然，跟踪是需要努力的。“艺术问政”或“书法问政”要重在“问”上，问出下文、问出实效、问出责任来。

近几年，“书法问政”已成为“两会”一种独特声音，“书法问政”在持续，官员的措施与办法也在不断跟进，但是，笔者仍然觉得“落地”的声音还是不够大。所以，让苏士澍主席再次为书法教育亟需解决的难题而呼吁，他说“去年一年多的时间，我走了二十多个省将近上百所学校，良莠不齐。影响书法进课堂的原因是什么？还是缺老师”。看来“红头文件”落到实处是需要时间的，所以，有人说“老提案议案”见证了改革的艰难。关于书法艺术与教育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“老提案”了，已成为参加“两会”书法家们屡次提及的热词。不过，书法人就是有这么一股理性与执着的精神，把“老提案”当做专研书法来做，也深知这个历程的漫长与艰辛。

在“书法问政”的同时，有时也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展览评审如何？创作能力怎样？协会发展如何？在“两会”期间，不知大家是否留心过或闲时去百度一下，就会发现有不少“赶场子”的展览，什么“两会”特别推出的艺术家，“两会”重点推荐的书法家，看看他们的作品，您又会作何感想呢？

厘米

陈献章是由使用茅龙笔作书而著名，“山居，笔或不给，束茅代之。晚年专用，自成一家。”陈献章一生屡试不第，隐居不仕，其晚年居广州新会白沙村，又称白沙先生。其书风苍老劲利，清新刚毅，可谓别具一格。茅龙笔并不柔软，故字迹较硬而少妖娆之态。后来也有人使用茅龙笔写字，但都模仿不出陈献章特有的书风。

在画坛上与文徵明、唐寅和仇英同称为“明四家”的居首人物沈周，虽是“吴门画派”的领袖人物，在书法上也有相当造诣。《明史》称沈氏之书仿黄庭坚，彼时吴宽也说“启南（沈周字）所藏黄书（指黄庭坚之书）数种，予尝获遍览”，由此可见沈氏学黄是直面真迹的；这般时所见的书学一式，如方法得当，则更可使沈氏得尽真传。书画之间，沈氏创作自然以画为主，从流传至今的沈周书法看，人们所熟识的具有明显黄山谷书风倾向的，应以沈氏四十之后的作品为多。

在明代前期书坛，有两位在书学上专师一家不择另格的典型人物，一位是上所述直宗黄庭坚的沈周，而另一位便是忠实追摹“宋四家”之首苏轼的吴宽。彼时吴宽的地位很高，工书法，有诗名。吴宽的书作酷似苏东坡，从个性风格看虽无创意可言，然这迥异于时的审美立场所反映的崇尚宋人意趣的另种艺术观念，客观上却影响了当时的书坛的创作趋向。

明代前期还有一些官位显赫不享名于书法的学人之书，成化十一年进士、武宗时由户部尚书迁升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鏊便是此中代表人物。王氏之书获径晋唐气格，长于行书和草书，笔体瘦劲冷峭富有个性。其可贵处在于绝去时风之弊，然与同时诸家相比终难立起一帜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●王德彦

海派书法家谭（十一）——沈曾植

沈曾植（1850—1922），字子培，号翼斋，别号乙盦，晚号寐叟，晚称翼斋老人、东轩居士，又自号逊斋居士等。浙江嘉兴人，出生于北京。沈曾植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，以“硕学通儒”蜚声中外，被誉为“中国大儒”。光绪六年（1880）进士，以主事观政刑部，鉴贵州司行走，后转江苏司郎中，在刑部约18年。1898年沈曾植受聘于两湖总督张之洞，执掌武昌西湖书院。之后又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（即今外交部）章京之职。1901年，盛宣怀聘沈曾植任上海南洋公学（上海交通大学前身）监督（校长），任此职位大约只有半年时间，即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春。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沈曾植上任伊始即致力于校务整顿与师资的安排，主张中西文并重，改革旧貌，办好特班，成绩卓著。1906年，进擢为安徽提学使，署理安徽布政使，并护理巡抚。1910年6月，沈曾植“因得罪贝子载振而告退隐”。沈为官清廉，在院五年，深得民心，归时，行李仅载书十万卷。秋，回到上海，寓开封路正修里”。这是沈曾植寓沪时间的开始，书法史书多云沈曾植在辛亥革命后寓沪，是不准确的。民国四年（1916年）乙卯春，识王国维于沪上，朝夕亲炙，穷研苦造，助王观堂能集古今之大成。1917年5月，沈曾植参与张勋之复辟运动，“五月初七日，沈闻张勋领军北上，抱病携子北行，声援复辟。十三日，逊帝复辟，授沈为学部尚书”，复辟失败后，沈曾植“乘船南还沪上”，还京都二月余。1922年11月21日，病逝上海。从由院隐沪，前后寓沪有10余年之久。沈曾植与郑孝胥、姚文藻等相往来，愤慨时事，语多嫉俗，谈新学者，因目为上海“宗社党”（也即君主立宪维持会）之重要人物。

沈曾植是书法大家，受到当时书法界的推崇，海内外求其字者颇多。沈曾植早精帖学，其后又由帖入碑，熔南北书风于一炉，得笔于包世臣，壮年嗜张裕钊。如1905年的书法作品点画颀长，黄庭坚的味道重些；1907年的字则结体瘦劲，表现出欧阳询的一些风格；1908年后，米芾的影响则更明显一些。到1910年，沈曾植的书法渐入成熟。但作为一代硕学大儒，深知成熟即包含着衰亡的危险。正如他在《艺菌所谈》中所云：“陈寿卿言：‘有李斯而古篆亡，有中郎而古隶亡，有右军而书法亡。’此语正与明人文亡于韩、诗亡于杜，书亡于颜同。”于是，从1912年起，沈曾植又开始了新的探索，王蘧常在《忆沈寐叟》说：“先生晚年自行变法，治碑帖于一炉，又取明黄道周、倪鸿宝两家笔法，参分隶而加以变化。”黄道周书法的结体变圆转为方折，变外拓为内撇；倪元璽的书法用笔生涩、点画浑厚苍茫，他们都强调气势，无论结体与用笔都开了碑学的先声。因此，沈曾植以黄、倪作为过渡是顺应潮流的。可以说，沈曾植的晚年取得了衰年变法的巨大成功，到达了他的书法事业的顶峰，赢得了世人的赞誉和身后的书名。所以笔者必须指出，沈曾植作为一代书法大师，如果不是广收博览，兼采百家，是不可能的。这也是对于我们当代书家成长的启示。

沈曾植的书法强调变化，抒发胸中之奇，几忘纸笔，心行而已。沈曾植以草书著称，取法广泛，熔汉隶、北碑、章草为一炉。碑、帖并治，尤得力于“二爨”，体势飞动朴茂，纯以神行，个性强烈，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。寐叟在临终前数小时仍握笔挥毫，写成三联。甲联书于五尺白冷金笺上：“石室竹卷长三尺，山阴草迹编千文。”有陈散原、冯梦华、吴昌硕等39人题跋。乙

联写在五尺宣纸上：“岑碣熊铭入甄选，金沙锈断助薪丝。”题跋者有马一浮等16人。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，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。如于右任、马一浮、谢无量、吕凤子、王秋湄、罗复堪、王蘧常等一代大师皆受沈曾植的影响。

《书林藻鉴》认为：“寐叟书，工处在拙，妙处在生，胜人处在不稳。”“拙”与“生”都是视觉效果陌生化的结果，是沈曾植大胆作书，可以求生的结果。而“不稳”之源头有可能来自于米芾。沙孟海先生在《近三百年的书法》中把沈曾植的书法列为“帖学”的殿军人物是有道理的。沙孟海称沈曾植“是个学人，虽然会写字，专学包世臣、吴熙载一派，没有什么意思的；后来不知怎的，像释子悟道般的，把书学的秘奥一旦豁然贯通了”。这“豁然贯通”的就是碑与帖。这与王蘧常先生在《忆沈寐叟》中称“先生生前先以书法为余事，然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，六十四岁后始以写字。至七十三岁去世，用力极勤，遂卓然成为大家”。二说大同小异，同的是称沈曾植大器晚成，不同的是一说沈中年之前“没有什么意思”；一说是“刻意经营，竭尽全力”。据沈曾植的生平经历来看，王蘧常更接近些。

沈曾植认为“无相杂而文生，物相兼而数颐”，这不仅可以看做是沈曾植的学术观，也可以看做是他的书学观。沈曾植早年精研帖学，汲取众家，后转碑学，最终以碑帖结合而成书坛大家。至于有学者指出碑与帖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，如草书者又想流畅通达，又要雄奇角出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曾熙认为沈曾植的书法特征是“生拙”和“不稳”，而这“生拙”的线条无疑是来自碑学，“不稳”的结体则是来自于帖学大家米芾。

简斋闲语

●简斋闲语